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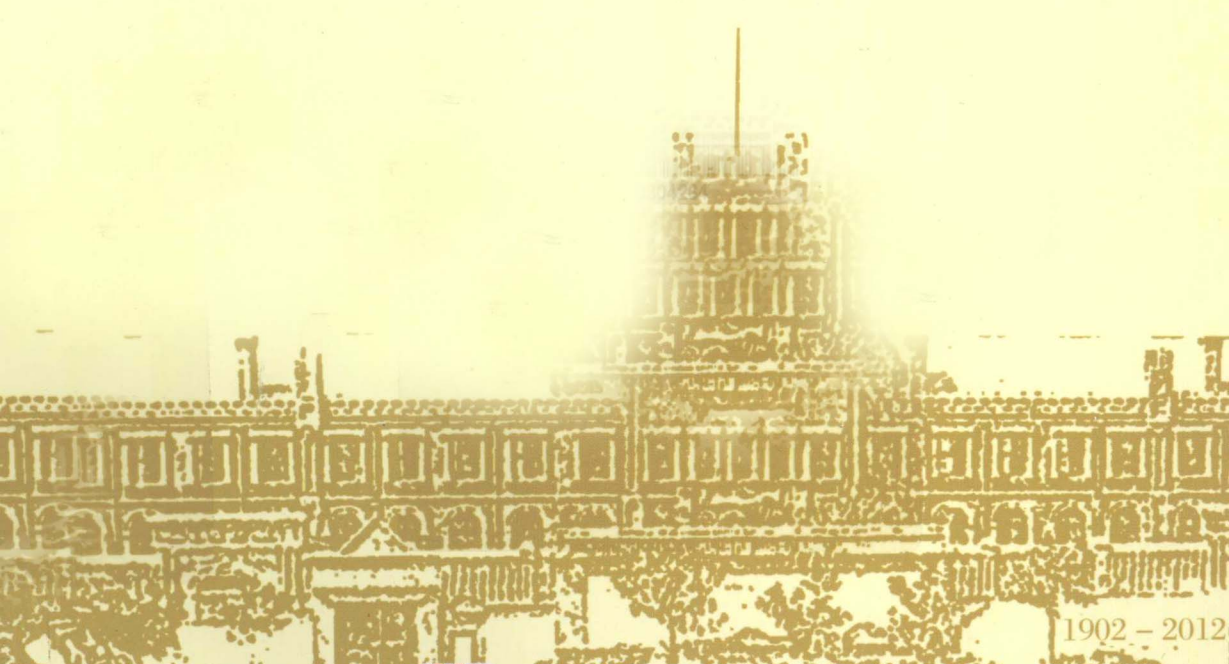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唯美与纪实 性别与叙事

——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研究

In Quest of Truth: Aestheticism, Life-writing, and Gender
Narrative in Virginia Woolf's Writing

郝琳 著



1902 - 2012



科学出版社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唯美与纪实 性别与叙事

——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研究

In Quest of Truth: Aestheticism, Life-writing, and Gender
Narrative in Virginia Woolf's Writing

郝琳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弗吉尼亚·伍尔夫对真理本质的思索和探知为主线，一方面重在揭示伍尔夫的现代主义创作与两个现代文学流派之间的契合关系——与“唯美主义”的异中有同和与“新传记”的同中有异；另一方面旨在阐明伍尔夫小说文本的两大性别叙事特征——“双声性话语”和“多角度叙述”。

本书适合喜爱英国现代文学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读者、大专院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学者以及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美与纪实 性别与叙事——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研究 / 郝琳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03-033974-4

I. ①唯… II. ①郝… III. ①伍尔夫, V. (1882~1941)—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2245 号

责任编辑: 刘彦慧 闵敬淞 / 责任校对: 冯 琳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李恒东 无极书装

联系电话: 010-6401 9074 电子邮箱: liuyanhui@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编务公司排版制作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5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

字数: 250 000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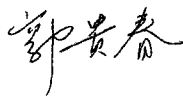
2012年5月8日，山西大学将迎来110年校庆。为了隆重纪念母校110年华诞，系统展现近年来山西大学创造的优秀学术成果，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

山西大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代，在“西学东渐，革故鼎新”中应运而生，开创了近代山西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百年沧桑，历史巨变，山西大学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学术实践，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办学业绩。百年校庆以来，学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创新，实现了新的跨越和腾飞，逐步成长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的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型大学，谱写了兴学育人的崭新篇章，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大学因学术而兴，因文化而繁荣。山西大学素有“中西会通”的文化传统，始终流淌着“求真至善”的学术血脉。不论是草创之初的中西两斋，还是新时期的多学科并行交融，无不展现着山大人特有的文化风格和学术气派。今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正是传承山大百年文脉，弘扬不朽学术精神的身体力行之举。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的编撰由科技处、社科处组织，将我校近10年来的优秀科研成果辑以成书，予以出版。我们相信，《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对于继承与发扬山西大学学术精神，对于深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对于促进山西高校的学术繁荣，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谨以此丛书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山大母校，祝愿母校在新的征程中继往开来，永续鸿猷。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目 录

i	▶ 总序	
1	▶ 绪论	
	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平	1
	批评家与伍尔夫夫人	5
	叙事学方法	11
18	▶ 第一章 伍尔夫与“唯美主义”	
	追溯渊源	20
	理论契合	24
	“存在的瞬间”与“刹那主义”	24
	“封套”与“形式”	26
	“真实”与“生命的奥秘”	28
	有意味的形式	30
	反中产阶级性	35
41	▶ 第二章 伍尔夫与“新传记”	
	斯特雷奇的“新传记”	43
	伍尔夫的现代传记观	49
	伍尔夫的“传记小说”	59
73	▶ 第三章 双声性话语	
	家庭罗曼史	73
	母亲的花园	76
	父亲的书房	86
	女儿的选择	94
	奥兰多之名	102

	意识之流	105
	保持距离	109
	谁在讲话	116
125	▶ 第四章 多角度叙述	
	蛛网式叙事结构	126
	两个灯塔	127
	车中之人	132
	空中书写	136
	套盒式叙事结构	141
	存在的瞬间	143
	时光流逝	147
	幕间	153
158	▶ 结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死	158
163	▶ 参考文献	
170	▶ 附录	
197	▶ 后记	

绪 论

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平¹

为什么要选择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和她的小说创作作为研究对象?

因为,她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伦敦最声名显赫的文学世家之一,其父莱斯利·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集批评家、哲学家、学者于一身,饱学博览,撰写过鸿篇巨制的《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和著名的《英国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她的家中,常常高朋满座、群贤云集,出入门庭的多为思想界、文艺界名重一时、出类拔萃之人,如托马斯·哈代、约翰·罗斯金(英国美学家、艺术评论家)、乔治·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以及弗吉尼亚的教父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美国诗人、散文家和外交家)等文豪大家;莱斯利·斯蒂芬还与小说泰斗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沾亲带故(莱斯利·斯蒂芬因病去世的前妻是萨克雷的小女儿哈里特·玛丽安·萨克雷)。在此家学渊源、人文荟萃的氛围之中,弗吉尼亚怎能不自幼耳濡目染、受益匪浅?

因为,她是著名文化团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Bloomsbury Group)中“高雅之士的皇后”(阿诺德·贝内特语)。这个集团以弗吉尼亚的哥哥索比在剑桥大学的同窗好友为原始核心,吸纳了一大批当时英国知识界上层最重要、最富创造性的才俊精英:弗吉尼亚(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及丈夫伦纳德·伍尔夫(政论家)、姐姐范尼莎(画家)及姐夫克莱夫·贝尔(画家、艺术批评家、美学家)、利顿·斯特雷奇(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罗杰·弗莱(画家、美学家,1910年,在伦敦格拉夫顿美术馆主办第一届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画展,展出塞尚、梵高、高更、毕加索、马蒂斯等画家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作,震动了英国的美术界和文艺界)、邓肯·格兰特(画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家)、E. M.福斯特(小说家)、T. S.艾略特(诗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家)等,以及两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剑桥长者贝特兰·罗素(数学家、哲学家)和G. E.摩尔(哲学家、新实在论的主要代表)。这个文人雅士的小圈子热衷于讨论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和伦理,倡导自由、真诚、情感、

¹ 费利斯·罗斯(Phyllis Rose)在《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平》(*Woman of Letters: A Life of Virginia Wool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中从社会批评的角度解读了伍尔夫的创作,指出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绝不是性别歧视所能够涵盖的。此处,仅借用其书名。

高雅的艺术、恒久而高尚的友谊以及智慧的幽默，漠视、睥睨和嘲讽野心、荣誉、权力等一切世俗的虚骄与荒谬，坚持“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的美学观念，主张艺术家摆脱功利目的、道德责任和艺术陈规，以超然的态度在纯粹的艺术形式中寻求一种不可名状的审美感情和内在真实的精神意义。“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视野开阔、思想解放、自由活泼、锐意创新的学术气氛为成长期的弗吉尼亚提供了良好的艺术熏陶和文学训练。

因为，她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最杰出的女作家，是与马歇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等男性文学大师齐名的意识流小说家；是见解深刻、文笔犀利的文学评论家，现代散文家，意识流小说理论的阐述者，小说新美学的倡导者；是热情而大胆的实验主义者和不懈追求小说形式革新的探索者；是古典文学充满怀旧冲动的推崇者和文学传统真诚而审慎的继承人。她一生创作了十部中长篇小说：《远航》（*The Voyage Out*, 1915）、《夜与日》（*Night and Day*, 1919）、《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 1922）、《达洛维太太》（*Mrs. Dalloway*, 1925）、《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奥兰多：一部传记》（*Orlando: A Biography*, 1928）、《海浪》（*The Waves*, 1931）、《弗拉西：一部传记》（*Flush: A Biography*, 1933）、《岁月》（*The Years*, 1937）、《幕间》（*Between the Acts*, 1941）；三部短篇小说集：《星期一或星期二》（*Monday or Tuesday*, 1921）、《闹鬼的屋子及其他》（*A Haunted House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1944）和《达洛维太太的宴会》（*Mrs. Dalloway's Party*, 1973），其中，代表作包括《墙上的斑点》（*The Mark on the Wall*, 1917）、《邱园记事》（*Kew Gardens*, 1919）、《达洛维太太在邦德街》（*Mrs. Dalloway in Bond Street*, 1923）等；350余篇论文、随笔、散文和书评，由其本人结集出版的有《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 1925）、《普通读者续集》（*The Second Common Reader*, 1932），去世后由其丈夫伦纳德和其他研究者编辑付梓的有《飞蛾之死》（*The Death of the Moth and Other Essays*, 1942）、《瞬间集》（*The Moment and Other Essays*, 1947）、《船长弥留之际》（*The Captain's Death Bed and Other Essays*, 1950）、《花岗岩与彩虹》（*Granite and Rainbow*, 1958）、《现代作家》（*Contemporary Writers*, 1965）、《书和画像》（*Books and Portraits*, 1977），其中，耳熟能详的名篇包括《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1924）、《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1929）、《妇女与小说》（*Women and Fiction*, 1929）、《三个旧金镑》（*Three Guineas*, 1938）等；一部人物传记：《罗杰·弗莱：一部传记》（*Roger Fry: A Biography*, 1940）；一部戏剧：《淡水：一部喜剧》（*Freshwater: A Comedy*, 1976）¹；一篇儿童故事：《露吞保姆的金顶针》（*Nurse*

1 最初创作于1923年，随后被长期弃置。直至1935年，伍尔夫才将其重拾案头，经大幅修改加工，由伍尔夫及其家人亲自出演剧中角色，作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戏剧之夜”的一出上演剧目，于1月18日在菲兹罗伊广场8号范尼莎的画室中进行了首次非公开演出。1967年，该剧1923年、1935年的两版剧本由Lucio P. Ruotolo编辑并撰写前言，在霍加斯出版社合集出版。

Lugton's Golden Thimble, 1966), 以及大量的书信日记。在她去世之后陆续由其丈夫等整理出版了《一位作家的日记》(A Writer's Diary, 1954)、《伍尔夫与斯特雷奇书信集》(Letters: Virginia Woolf and Lytton Strachey, 1956)、《伍尔夫书信集》(六卷本)(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6 vols), 1975-1980)、《伍尔夫日记》(五卷本)(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5 vols), 1977-1984); 还有其生前未来得及完成或发表的一些著述, 如确定其创作事业方向的早期作品《一个小说家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Novelist, 1985)、自传文稿《往事杂记》(“A Sketch of the Past”)——后出版时题名为《存在的瞬间: 未发表的自传作品》(Moments of Being: Unpublishe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1976), 以及已列入其写作日程的一部有关英国文学史的随笔集, 而她仅完成了其中的第一篇《阿依》(“Anon”, 又被称为《随意阅读》或《翻过一页》, 由《阿依》和《读者》两章组成)的手稿。她著述等身、才思敏捷、文采斐然, 游走于传统文学的典雅雍容与现代文学的新颖奇特之间, 一方面继承了以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乔治·爱略特等为代表的18、19世纪女性写作的优秀传统, 另一方面更为多丽丝·莱辛、缪里尔·斯帕克、艾丽斯·默多克等当代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姑母的遗产”¹; 她飘逸如一只斑斓透明的蝴蝶、灵动而虚幻的小说, 她坚实如柱、坦直而缜密的文学随笔, 她不断翻新的意识流手法, 她蕴意无穷的象征意象, 她“非人格化”的诗性语言, 她融合绘画因素和音乐技巧的描写叙述, 她对死亡的抗争与拥抱, 她对往昔的超越与迷恋, 她对人类无意识领域的索解, 她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追问, 她对未及言说和无法言说之物的言说, 她对难以捕捉之真实的捕捉, 她为生活的瞬间汲取永恒的价值, 她为孤独的个体建构爱、和谐与包容的精神家园。总而言之, “她一度被指责为狭隘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成为她的时代、她的精神世界和现代艺术思想的精髓”²。

抑或因为, 她是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女权思想的代言人, 是女性被抹消的真实历史和文学传统的拯救者与书写者——从文学批评随笔《简·奥斯汀》、《论〈简·爱〉与〈呼啸山庄〉》、《论乔治·爱略特》、《玛丽·奥斯顿克拉夫特》、《多萝西·华兹华斯》、《“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萨拉·柯勒律治》、《范妮·伯尼的隔山姐姐》到女性主义的战斗檄文《一间自己的房间》、《妇女与小说》、

1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指出, 女性从事创作的物质前提条件除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免受外界和男性审视目光的侵扰之外, 还需要有一笔稳定的经济收入, 以确保女性远离贫困和奴隶般的劳作, 远离恐惧、辛酸和愤怒, 在写作中保持一份平和与从容, 从而使她天赋的花蕾尽情绽放。文中, “我的姑母”去世后留下了五百英镑的遗产, 这笔遗产不仅保证了“我”衣食无忧, 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与写作, 而且“的确向我揭示出一片蓝天, 取代了弥尔顿建议我永远崇拜的那个高大魁梧绅士形象, 是一望无际蓝色天空的开阔视野”。(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 瞿世镜编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年, 第98页)而与物质遗产相对的精神遗产, 即文学传统, 在伍尔夫看来, 同样应该来自于女性的“母系前辈们”, 对于她而言, 18、19世纪无名和有名的女性书写者都是她的“姑母”, 而对于她身后的当代女小说家们而言, 她无疑更是一位遗产丰厚的“姑母”, 女性文学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代代相传的承继之中不断由湮没走向繁盛辉煌。

2 王家湘:《二十世纪的伍尔夫评论》, 见《外国文学》1999年第5期, 第61-65页。

《女人的职业》、《三个旧金币》，她强烈抨击父权制、以男性社会“局外人”自居的姿态，对女性受压迫、受压抑的社会根源的揭示，对男性以女性为“镜像”自夸自大的嘲讽，以及她通过写作重建女性话语权利乃至社会权力的坚持与努力，无不鲜明而有力。

抑或因为她命运多舛——十三岁丧母、在随后大约十年的时间中又陆续失去了令她爱恨交织的父亲、慈母般的同母异父的姐姐斯特拉·达克沃思和她敬爱一生、奉若神明的哥哥索比；她身患“狂郁性精神病”（manic-depressive psychosis），几度疯狂，几度自杀未遂；她童年时遭受过同母异父兄长的性骚扰，成年之后曾经的伤痛依然清晰可见、难以愈合，致使她对同性常常有着一份超乎强烈的情感索求与依恋；她自溺身亡，而真正的原因至今不明¹；她纤弱而敏感，需要他人不断地给予保护与肯定，却常常独自一人健步如飞、在荒野中不倦地行走；她既像母亲一般富于感情、善于幻想、充满诗意、积极向上，又有着父亲的理性、辨识力、冒险精神、语言天赋、写作的才能以及坚韧背后不堪一击的脆弱和对失败的焦虑恐惧，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秉性在造成她精神人格严重分裂的同时，却成就了她独树一帜的小说风格和“双性同体”（androgyny）的文学观。

凡此种种，在选题之初于脑海中交织交叠，难分轩轻；而随着资料查阅、作品细读和思索推理的不断深入，某些原因已然淡出，而另一些原因逐渐清晰，最终浮现出“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研究”这一论题及其整体构架；或者，按照“先果后因”的后现代观点，顺序恰恰相反，即正是在选定具体论题之后，才对选择论题的缘由做出了一种取舍。

然而，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苏珊·S.兰瑟（Susan Sniader Lanser）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a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 1992）中借友人的观点指出，“为什么”（why）提出的问题并非科学问题，而“怎样”（how）提出的问题方为科学问题。因此，上述的追问与回答不妨看做是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平与创作实践的一番回顾与梳理，而解说评论界以及本书是如何具体研究伍尔夫及其小说创作的，才是一条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批评路径。

1 艾厄玛·哈勃特·邦德（Alma Halbert Bond）在《谁害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部心理传记》（*Who Killed Virginia Woolf? A Psychobiography*.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Press, Inc. 1989）中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剖了伍尔夫生命中最重要几位亲友（父母亲、丈夫、姐姐范尼莎、女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对于她的人格、性格、感情等方面的影响，认为伍尔夫之死与他们均有干系，是他们共同塑造了伍尔夫分裂的精神状态，并在后者面临最后的彻底崩溃之时，或无知无觉、或爱莫能助、或漠然置之，甚或作为亡灵向伍尔夫发出了死亡的召唤。事实上，每一个伍尔夫的研究者，都难以避开伍尔夫之死这个谜题，并试图破解之，或认为伍尔夫死于对其创作力枯竭的焦虑，或认为她死于对战争和现代社会的绝望，或认为她死于长久以来渴望拥抱死亡的冲动，或认为她确实如其遗书中所说，死于对精神病再度来袭的恐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批评家与伍尔夫夫人¹

鉴于伍尔夫常常“使文学批评采取了小说的形式”²，即以讲故事的方式阐述观点，在开始正文部分的论述之前，作为伍尔夫的研究者，作者欲效仿她，借一段轶事概述迄今为止评论界对于伍尔夫及其作品的研究状况和成果。

1924年5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匆匆跳上由滑铁卢开往李奇蒙德的一列火车，进入车厢落座后不久，我就被对面坐着的两个人，确切而言是其中的那个女人吸引住了。她面庞瘦削而坚毅，明亮的眼神中隐隐闪烁着焦躁与狂乱，气质高雅，像是一位艺术家，显然对绘画和音乐都有着非凡的鉴赏力，但我敢肯定她是写小说的，而且我想我已认出她就是著名的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夫人本人，因为她正在向她身旁的那个人饶有趣味地讲着《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中的故事³：几个星期前，她登上从李奇蒙德到滑铁卢的火车，车厢里已经坐着两个乘客，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她听到了两人之间一些断断续续的交谈。被她称为布朗夫人的老太太衣着整洁，虽然一副窘困寒酸的模样，但瘦小而顽强，脆弱而英勇，忍受着强烈的痛苦，面对史密斯先生（伍尔夫夫人这样称呼那个男人）的胁迫，尽力保持着教养和尊严。她给伍尔夫夫人“留下的印象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它就像一阵穿堂风，一股烧焦东西的烟味儿，扑鼻而来”⁴。因为，在伍尔夫夫人眼中，这是“一位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无穷多样性的老太太；她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穿任何衣服，说任何语言，并且天晓得什么事情。但是，她说的话，她做的事，她的眼睛、鼻子、语言、沉默都有一种压倒一切的魅力，因为，她当然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灵魂，她就是生活本身”（《布》，317页）。而“所有的小说都是从描写对面角落里的一位老太太开始的”（《布》，300页），“男女作家们之所以会去写小说，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诱惑，要把这盘踞在他们心头的人物形象塑造出来”（《布》，292页），但是“只有少数人抓住了这个魔影；多数人不得不满足于扯到一片衣服或一绺头发”（《布》，292页）。比如，以贝内特先生为

1 《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是伍尔夫于1924年5月18日在剑桥大学宣读的一篇论文，当时以《小说中的人物》为题，后收入伍尔夫的随笔散文集《船长弥留之际》(The Captain's Death Bed and Other Essays)。文中，伍尔夫认为，小说的中心是人物，人物的核心是他的“人性”，而布朗夫人实际上就是“人性”的象征；因此，她坚决反对以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H. G. 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为代表的爱德华时代小说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捕捉永恒人性和描写真实生活方面的“物质主义”，提倡注重人物“灵魂”和内心世界的观察角度和创作方法。之前，赫塔·纽曼(Herta Newman)仿此篇名写有《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布朗夫人：走向不确定的现实主义》(Virginia Woolf and Mrs. Brown: Toward a Realism of Uncertainty,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一书。

2 刘炳善：《书和画像（译序）》，见《书和画像》，刘炳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3页。

3 在短篇小说《一部未写的小说》(An Unwritten Novel)中，伍尔夫讲述了一个与此相似的故事：同样陌生缄默的女人，同样痛苦忧伤的表情，这个被伍尔夫称做“米尼·马什”的女人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她的存在是一个引发作者无限遐想和精度的谜，作为人性、灵魂和生活本身的象征，她和“布朗夫人”一样是伍尔夫塑造的一个永恒的人物形象。

4 《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见《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以下凡出自本篇（简称《布》）的引文，为避烦琐，均仅于括号中标注页码。

代表的爱德华时代的作家描绘“布朗夫人”的方式就是失败的：他们干脆不看老太太一眼，而是将目光“使劲地、探索地、同情地向窗外望去，注视着工厂、乌托邦，甚至还注视车厢里的装饰物和壁毯”（《布》，308页），开始描述癌症和印花布这些与人物形象塑造无关的“物质”，于是，这个坐在三等车厢里的难以形容的老太太就从他们的手指缝里溜走了；因为，“他们或能叙说她的遭遇，她的家庭，她的住宅，她的生活环境，但都写不出她本身”，而“写一本关于布朗夫人的三卷本的小说，远比你用几个句子刻画出她独特的天性，传达出她的外貌或她的嗓音在目击者身上激起的印象之流要容易得多”¹。

作为人性和生活本身象征的“布朗夫人”或“布朗夫人”的内在真实，从客观上讲，确实是难以描述的。最初，伍尔夫夫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不过是尽可能精确地把他们所说的话报道出来，把他们所穿的衣服详细地描述一番，把在我的头脑中纷至沓来的各种景象绝望地、杂乱无章地全都端出来”（《布》，309页），而这也“只不过是描述事情的方法，而不是事情本身”²。即便如此，讲完“布朗夫人”的故事之后，她并未停下来，而是继续给她身边的旅伴讲了雷切尔·温雷克、凯瑟琳·希尔伯里和雅各·弗兰德斯的故事³，以及另外几个短小精悍、令人耳目一新的小故事⁴，讲述的过程中，我可以感觉到她在大胆而谨慎地摸索和尝试着，她的目光始终紧紧地盯住故事中的人物不放；当讲到达洛维太太⁵的故事时，她的语气变得愈加艰涩——我明白，毕竟前面的三个人物本身都是年轻未知的生命，一种不确定的叙述方式可能恰好合适，而达洛维太太及其“重身”（double）塞普蒂莫斯⁶却是成熟的人物，他们都

1 [苏]米哈尔斯卡娅：《弗吉尼亚·伍尔夫》，见《伍尔夫研究》，瞿世镜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2 《远航》，黄宜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3 分别是《远航》、《夜与日》和《雅各的房间》这三部伍尔夫的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由于正文部分的论述中将较少涉及《夜与日》，这里只简单介绍。这是一部模仿维多利亚时代古典爱情小说的作品，它暂时中止了《远航》在小说技法 and 主题上的大胆尝试，较为单纯地讲述了两对青年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虽然考察了传统的婚姻模式，探讨了20世纪初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两性关系中的角色以及在社会工作中的价值等问题，但叙事结构和叙述手法都毫无新意，历来被认为是伍尔夫最平庸的一部作品，尽管诗化的语言、敏锐的感觉、空灵的意象等这些伍尔夫作品中的重要特征在此已初见端倪；根据多数研究资料，唯一具有评论价值的是女主人公凯瑟琳的身世兴趣：她出身名门，外祖父是一位著名的诗人，父亲是著名的作家，她每天上午的工作就是协助母亲撰写关于外祖父的回忆录。然而，与喜欢弹钢琴的雷切尔、立志作画的莉莉·布里斯科、偷偷写诗的伊莎，以及负责排演戏剧的拉·特洛普等伍尔夫所塑造的众多女性艺术家不同，凯瑟琳的爱好却是数学和天文，她常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演算数学难题，这是她对于男性家族传统半无意识半发自内心的反抗，也是对于遣词造句和（伍尔夫非常奇怪地称之为）“杂乱无章、蛊惑人心、含混不清的最优美散文”的一种反抗，这一点也最终决定了凯瑟琳的婚姻选择——与威廉·罗德尼（他关于莎士比亚、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是不容置疑的，但诗才平庸）解除婚约而转向拉尔夫·丹纳姆（他虽然也梦想着成为诗人，但首先是一位现实而理性的律师）。

4 指伍尔夫早期创作中的几部短篇小说代表作《墙上的斑点》、《邱园记事》、《星期一或星期二》、《弦乐四重奏》、《一部未写的小说》、《闹鬼的屋子》等。其间，伍尔夫试图抛弃传统的“情节”，寻求一种新的创作方法，以表现人物内心的活动和情绪感受的变换，反映人物对于（枯燥、单调、乏味）客观真实的（丰富多彩、变化无穷）主观感受。她在短篇小说方面所做的种种大胆有益的尝试为《达洛维太太》、《到灯塔去》、《海浪》等后来的几部现代文学经典之作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短篇小说本身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5 伍尔夫创作高峰期的首部代表作《达洛维太太》中的同名女主人公。

6 《达洛维太太》中身患“弹震症”的退伍士兵，精神失常，伍尔夫让他在小说中最后替达洛维太太跳窗身亡，在他的死亡中，后者获得了净化抑或启迪，重新选择了生活，他代表了达洛维太太内心混乱疯狂的一面。

被自己回忆的负担重压着，且具有深刻的反思能力，要讲出他们的真实生命，困难超乎想象——可就在我为伍尔夫夫人担心的时候，她脸上的神情陡然一变，喜悦兴奋之意溢于言表，我想她是找到方法了，果然她打断了故事自语道：我要在我的人物身后挖掘美丽的洞穴，洞穴要彼此连接，最终每一个都呈现在当下的瞬间，我把这称做“隧道挖掘法”（tunneling process），也就是说，我要一段一段地讲述过去¹。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之后，伍尔夫夫人的这个故事立刻变得精彩起来，两位主要人物达洛维太太和塞普蒂莫斯的形象也都变得异常的清晰、生动和真实；接着，兴致盎然的伍尔夫夫人又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这些聚精会神的听众讲了著名的灯塔之行的故事、英俊潇洒的奥兰多如何变成女儿身的故事，以及伯纳德和他的六个朋友一生离合聚散的故事²，每一个都那么引人入胜。不知不觉旅程已过了大半，好在火车仍在飞驰，伍尔夫夫人也意犹未尽，稍事休息之后，帕吉特一家的故事³开始在我们的耳畔响起，不过说实话，这个故事听起来略显平淡，不像前边的那些让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看见我们有些面露不满，伍尔夫夫人低头沉思片刻之后，决定再给我们讲一个乡村露天表演的故事⁴作为补偿，当然，聪明的女小说家这一次没有让我们失望，不过，她突然提前下车了，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疑问：我们最后听到的这个故事是她原本决定要讲的那一个吗？会不会还有一些细微的订正和修改？

其实，一路上，除了专心致志听伍尔夫夫人讲故事之外，我还特别注意到车厢里那些进进出出的乘客，他们大都目光敏锐、善于观察，头脑睿智、长于分析，他们或是对讲故事的伍尔夫夫人本人感兴趣，或是对伍尔夫夫人所讲的故事本身感兴趣，于是，以伍尔夫夫人和她的故事为谈资，这里有了一次评论家们的小小聚会：E. M.福斯特先生（E. M. Forster）代表与伍尔夫夫人同时代的评论家发言道，她讲故事的方式新颖奇特，语言优美，感觉纤细，以意识流手法见长，反传统，但由于仅局限于探索微妙难解的主观经验，因此还不是讲得最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早期的小说》

1 Susan Dick. "Literary Realism in Mrs. Dalloway, To the Lighthouse, Orlando and The Waves," in Sue Roe and Susan Seller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51. 根据伍尔夫日记中的记述。

2 分别是《到灯塔去》、《奥兰多：一部传记》和《海浪》中的主人公，这三部小说以及之前的《达洛维太太》风格各异，但都堪称伍尔夫的经典之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备受推崇，也是为伍尔夫评论家们关注最多的四部作品。

3 指《岁月》这部伍尔夫创作后期的小说作品。起初，伍尔夫意图将其写成一部“小说—散文”（novel-essay），称为《帕吉特家族》，希望以夹叙夹评的方式，讲述帕吉特家族祖孙三代的出生、婚姻、事业、死亡等方面的生活故事，并囊括历史、政治、两性、教育、艺术、文学、人生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思想观念；后于出版之时，更名为《岁月》，全书分为十一章，每章冠以一个年份，从1880年到“当今的日子”，跳跃式地记录了帕吉特家族近半个世纪的经历，同时散文部分的论述大多删除，只留下了每一章引子中关于时间、季节、气候、社会政治状况等方面的宏观描述。关于这部小说的价值，评论界观点不一，但大多倾向于认为它背离了伍尔夫一贯的实验主义原则，缺乏创新，某种程度上是对前期现实主义小说《夜与日》中写作手法的一种回避，是伍尔夫的一部平庸之作，特别是，由于在人物塑造方面比较趋向于直截了当的白描，在叙述方式方面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全知视角，因而对人物内心生活的展现难免流于表层、缺乏深度。

4 《幕间》是伍尔夫最后一部完整的作品，她辞世时，虽然已完成书稿，但尚未做付印前的最后修改。书中的全部情节压缩在1939年6月的一天，但却通过一场具有象征性的乡村露天戏剧表演，展现了整部英国史和英国文学史。作为伍尔夫的绝笔之作，《幕间》被认为是她“最富雄心而又最完美的一部作品”（埃德温·米尔语）。

（“The Early Novels of Virginia Woolf”，1936）；《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942）]；鉴于他与伍尔夫的私交及其在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上的权威地位，随后发言的一些评论家也基本上对伍尔夫的创作成就持大致相同的评价，即以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感观意识见长，充分展现了女性富于灵性的诗意和想象力；对此，一路上陪同伍尔夫夫人的昆廷·贝尔（Quentin Bell）颇为不满，而且沿着上述思路展开的讨论很快便陷入了停滞，于是，沉默片刻之后，昆廷·贝尔根据自己对姨母的了解和掌握的大量家族内部的私密材料，详细讲述了伍尔夫的家庭、爱情、婚姻、创作、精神病、童年创伤、自溺身亡等生平经历[《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部传记》（*Virginia Woolf: A Biography*, 1972）]；由于他的叙述翔实充分，大家对伍尔夫夫人有了新的认识，旋即分为若干小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发言的是心理传记派评论家们。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认为伍尔夫的作品和她的生活可以互为印证，在她的创作中，顿悟（epiphany）、存在的瞬间（moment of being）、对未知和普遍真实的探求是理解她思想感情的关键[《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一生》（*Virginia Woolf: A Writer's Life*, 1984）]；约翰·梅法姆（John Mepham）强调伍尔夫在几乎每一部作品的技法和形式上都做出了大胆的创新实验，而她的每一个尝试都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人们头脑中纷繁的意识和生活的本相[《弗吉尼亚·伍尔夫：文学人生》（*Virginia Woolf: A Literary Life*, 1991）]；由于昆廷·贝尔对伍尔夫精神病症的介绍，加之她讲故事时捉摸不定的声音语调，以及所描绘的杂乱飘忽的感觉印象、流露出的惶惑恐惧之情，另一些评论家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伍尔夫特殊的心理状态上，马克·斯皮尔卡（Mark Spilka）指出，伍尔夫精神失常的根源在于自幼连失多位至爱亲人的打击给她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心理创伤，这使得她深感生命的短暂与脆弱，因而试图在断裂的瞬间中发现和把握永恒[《伍尔夫与悲痛的较量》（*Virginia Woolf's Quarrel with Grieving*, 1980）]；露易丝·德萨尔沃（Louise A. DeSalvo）则推测伍尔夫“狂郁性精神病”的发生与她童年时所遭受的性骚扰有关，而这种经历使得她笔下的人物常常视自己的童年生活为黑暗恐怖、不堪回首的一幕[《弗吉尼亚·伍尔夫：童年性骚扰对她生活及创作的影响》（*Virginia Woolf: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on Her Life and Work*, 1989）]，等等。

对于心理传记派评论家们的见解分析，关注社会问题的批评家们的观点迥然相异，在他们看来，伍尔夫不仅描写现实，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费利斯·罗斯（Phyllis Rose）阐述了伍尔夫的阶级观和战争观[《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平》（*Woman of Letters: A Life of Virginia Woolf*, 1978）]；亚历克斯·沃兹德林（Alex Zwerdling）认为伍尔夫是一位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社会权力结构及其运作、个体经验在社会现实中的形成过程等问题始终是她关注的焦点所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现实世界》（*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d*, 1986）]；马克·哈瑟（Mark Hussey）

分析了伍尔夫通过艺术手法对社会弊端、特别是战争本质的揭示[《现实世界的歌唱：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的哲学观》(*The Singing of the Real World: The Philosophy of Virginia Woolf's Fiction*, 1986)；编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战争：小说虚构、现实与神话》(*Virginia Woolf and War: Fiction, Reality and Myth*, 1991)]，等等。

重视内部研究的评论家们对伍尔夫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颇感兴趣，他们着重分析了伍尔夫在象征意象、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蒙太奇、多视角叙述等意识流手法上的运用与创新。例如，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等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 1945)、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之《棕色的袜子》(“The Brown Stocking” in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1946)、罗伯特·汉弗莱(Robert Humphrey)的《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Modern Novel*, 1954)、利昂·伊德尔(Leon Edel)的《现代心理小说》(*The Modern Psychological Novel*, 1955)、梅尔文·J.弗里德曼(Melvin J. Friedman)的《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 Study of Literary Method*, 1955)等。

年龄较大一些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认为，双性同体观是理解伍尔夫小说的关键。例如，南希·巴赞(Nancy Bazin)表示，在伍尔夫的每一部作品中，作者都力图通过探求男性品质和女性品质这两种对立倾向之间的和谐平衡，来建立一种自我的整体感[《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双性同体观》(*Virginia Woolf and the Androgynous Vision*, 1973)]；而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却批评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念是“一个无性与不育的隐喻”，一个她借以压抑怒火、消除男性读者敌意的神话，因此是另一种形式的压抑，塑造了另一种完美女性的幻影，对后来的女性作家们而言，伍尔夫同样是一个必须首先予以扼杀的“房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 (of Fiction)]¹ [《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1977)]。

相对而言，年轻一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则有着更为广阔视野，她们借鉴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等现当代理论，以女性叙述方式、女性作家在创作中面对的困难和局限以及在小说形式和语言运用上的创新突破等问题为核心，从全新的视

1 在《女人的职业》一文中，伍尔夫指出，从精神上讲，一个女人要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和表达观点，首先必须与一个幽灵——“房中的天使”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因为，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理想女性的化身，这个“房中的天使”是一位充满魅力的家庭女主人，她纯洁、温顺、优雅，富于牺牲精神，没有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赞同男人们的见解，视女人公开谈论人际关系、道德、性别等方面问题的举动为大逆不道，不遗余力地劝诫年轻女性们学会撒谎和伪装，以成为男人心目中的纯洁女人，从而获得男人们在生活上的丰厚供养。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天使”的存在必然会扼杀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表达愿望的女性作家们的创作生命。根据伍尔夫的这一论点，肖瓦尔特认为伍尔夫富于传奇色彩的“双性同体”观，本质上，恰恰是将其本人塑造成了一个因惧怕冒犯编辑、出版商、批评家、读者等形形色色男性权威而低声顺气、温言款语的“房中的天使”，而由于她在女性文学传统中的权威地位，她要求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回避愤怒、消弭仇恨、保持平和的教导抑或律令，必定会严重阻碍后者从女性的角度自由表达观点和抒发感情。

角再度阐释和解读了伍尔夫的作品。例如，陶丽·莫依(Toril Moi)认为伍尔夫进行的是解构主义式的创作，她反传统的叙述手法推翻了男性大师们建立的经典小说程式，多视角叙述消解了人物形象的确定与单一，诗化的散文体和多义性的语言颠覆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所倡导的明晰与理性逻辑[《性/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1985)]；梅基科·米诺-平克尼(Makiko Minow-Pinkney)阐述了相似的观点，即伍尔夫的实验性小说通过对男性所划定的主题、情节、结构等界线的僭越，反叛和摧毁了男权社会的秩序、规范及准则[《弗吉尼亚·伍尔夫与主题问题》(*Virginia Woolf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 1987)]；对此，简·马修斯(Jane Marcus)特意从语言的角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盛赞伍尔夫是一位“身着维多利亚时代衣襟的游击队战士”(guerilla fighter in a Victorian skirt)[《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倾向》(*Virginia Woolf: A Feminist Slant*, 1983)]；《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父权制语言》(*Virginia Woolf and the Languages of Patriarchy*, 1987)]；伊丽莎白·埃布尔(Elizabeth Abel)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了伍尔夫在母性根源和父亲认同之间的徘徊与抉择[《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心理分析小说》(*Virginia Woolf and the Fictions of Psychoanalysis*, 1989)]；帕特利希亚·劳伦斯(Patricia Oudek Laurence)综合 20 世纪的文学理论指出，伍尔夫的创作形式是一种新的“沉默”修辞学，借助这种女性沉默，她动摇了父权制乃至整个西方的语言观、言说观和沉默观[《阅读沉默：英语传统中的弗吉尼亚·伍尔夫》(*The Reading of Silence: Virginia Woolf in the English Tradition*, 1991)]；苏珊·S.兰瑟(Susan S. Lanser)通过后现代女性主义叙事理论探讨了伍尔夫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和女性叙事权威的问题[《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a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 1992)]、赫塔·纽曼(Herta Newman)认为伍尔夫的作品在角色塑造、身份和自我的生成、艺术家形象等方面具有一种与现实主义相悖的不确定性[《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布朗夫人：走向不确定之现实主义》(*Virginia Woolf and Mrs. Brown: Toward a Realism of Uncertainty*, 1996)]、托尼·杰克逊(Tony E. Jackson)和詹姆斯·J.米拉基(James J. Miracky)分析了伍尔夫及其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家在小说叙事结构、性别观念以及风格特征方面的创新和异同之处，相关作品有《现代主义的主体：艾略特、康拉德、伍尔夫与乔伊斯小说虚构中的叙事变化》(*The Subject of Modernism: Narrative Alterations in the Fiction of Eliot, Conrad, Woolf and Joyce*, 1994)、《小说的新生：伍尔夫、福斯特、辛克莱与劳伦斯小说中的性别与风格》(*Regenerating the Novel: Gender and Genre in Woolf, Forster, Sinclair, and Lawrence*, 2003)；苏珊·哈里森(Suzan Harrison)和莉萨·威廉姆斯(Lisa Williams)分别研究了伍尔夫对尤多拉·韦蒂和托尼·莫里森这两位美国当代女小说家的影响，以及后者在借鉴和继承伍尔夫创作主题与叙述手法的基础之上，扬其长补其短的努力与贡献，其相关作品为《尤多拉·韦蒂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性别、风格与影响》(*Eudora Welty*

and Virginia Woolf: Gender, Genre, and Influence, 1997)、《托尼·莫里森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作为局外人的艺术家》(The Artist as Outsiders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and Virginia Woolf, 2000);此外,发言的还有艾厄玛·哈勃特·邦德(Alma Halbert Bond)[《谁害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部心理传记》(Who Killed Virginia Woolf? A Psychobiography, 1989)]、苏·柔依(Sue Roe)[《创作与性别: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实践》(Writing and Gender: Virginia Woolf's Writing Practice, 1990)]、丹尼尔·弗勒(Daniel Ferrer)[《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疯癫的语言》(Virginia Woolf and the Madness of Language, 1990)]、帕米拉·卡基(Pamela L. Caughie)[《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后现代主义:自我追寻与自我质疑中的文学》(Virginia Woolf and Postmodernism: Literature in Quest and Question of Itself, 1991)]、安娜·思纳斯(Anna Snaith)[《弗吉尼亚·伍尔夫:公开协商与私下协商》(Virginia Woolf: Public and Private Negotiations, 2000)],等等。显然,参与上述讨论的批评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观点繁复新颖,从元叙事、女性叙述话语到结局的悬置、中心的虚无、作者权威的消解再到隐喻之整体性与换喻之连续性的矛盾与和谐、反讽与重复等,不一而足,令人耳不暇听;评论家们以深厚广博的现当代文学理论背景为依托,聚焦于伍尔夫小说作品中叙事策略和话语方式的研究,这一方面连接着伍尔夫的生活经历、性别身份、天赋秉性和心理状态,另一方面更决定了伍尔夫小说特有的文本效果及其所蕴含的后现代性特征,由此掀起了伍尔夫评论的又一个新高潮。

.....

讨论仍在继续,一旁洗耳恭听的我逐渐萌发了一种想要抒发己见的渴望。我仔细聆听过伍尔夫夫人讲述的故事,也从众多批评家们的评论中获得了丰富而深刻的启迪,于是,在大家的注视下,我说话了¹。

叙事学方法

以伍尔夫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淡化和疏远了情节,但这并不意味着故事本身的淡化和疏远。写小说,从本质上而言,永远都是在讲故事,而讲故事就是叙事。

按照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的说法,叙事是由能指-叙述和所指-故事一同来体现的,“故事其实是被叙述的内容;叙事是叙述的形式,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文字组成的文本;而叙述是指叙述的方法”²。借助叙述这种语言行为,叙事的本质

1 《幕间》中最后一句话是:“然后大幕升起来了。他们说话了。”(《幕间》,谷启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2 董小英:《叙述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页。